绪　论

发生在 1937 年与 1938 年冬春之交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以 30 万以上中国同胞被屠杀，数以万计的妇女遭凌辱，无数住宅、商店、机关被焚烧和抢劫，而震惊中外。

对于这一惨痛史实，中外学者及有关人士，自事件发生以来，发表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章与资料，将其惨绝人寰的真相，公之于众，揭露了侵略者的血腥罪行，慰藉了无辜惨死者的冤魂亡灵。但是，将这一事件真正作为一段历史来进行系统的、完整的研究，还是 70、80 年代的事情。1979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印了供内部交流用的小册子《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该书虽只有将近 8 万字的篇幅，但其研究的首创性与开拓性，功不可没。此后，1985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高兴祖教授的著作《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全文 7 万字，文字生动、简炼，雅俗共赏，具有普及教育的功能。1987 年冬，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 50 周年之际，江苏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由“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编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一书，全书共 10 章、17.5 万字，系统论述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背景，日军烧、杀、淫、掠的暴行，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该书出版后，即成为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最具权威性的一部著作，在国内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对抗日战争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对少数日本右翼分子翻案谬论的不断回击，也随着国内外关于南京大屠杀档案、口碑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促进了对于这一段历史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本书的主编、副主编都是当年编著《史稿》的主要成员。我们深深感到 面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观点、新资料的不断涌现，面对少数日本人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险恶用心,昔日 17万字的《史稿》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形势的需要。于是，我们决心在《史稿》所奠定的基础上，大量吸收新鲜观点与资料，重订框架结构，用 5年的时间，写成本书。

“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上触目惊心的事件,有其特定的背景、内容和时空范围。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简单说来，就是日本的侵略、暴行和中国军民的抵抗。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格局和环境之下，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明治维新后、1874年出兵进犯台湾事件,中经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等,直至 1937 年 7月 7 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平津而至淞沪，再至首都南京。

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亦非自南京大屠杀始。甲午战争中，日军占领旅顺后，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大屠杀，中国同胞死难 1.8 万人；八国联军之役，日本侵略军仅在天津郊区纪家庄一地，即屠杀了 2000 多居民,在平津地区共抢劫白银367万两；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中,日军以种种残暴手段杀死中国军民 3945人、杀

伤 1537 人，中国同胞的财产损失近 3000 万元；自“九一八”事变至 1932 年底，在东北用各种酷刑杀死中国军民 23662 名，中国方面在事变中共损失公私财产 200 亿元；“七七”事变发生后，又在朔县、宁武各屠杀 4000 余人，在成安屠杀近 6000 人，在宝山屠杀 11000 余人。在这些屠杀中，杀人比赛、枪刺、砍头、活埋、焚烧等残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军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抵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侵略，哪里有屠杀，哪里就有反抗。在这里，军民自发或自觉的抵抗，同政府的态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政府持抵抗方针时，军民固可受其鼓舞，进行有领导、有组织的抵抗；在政府持“不抵抗”方针时，广大军民面对敌人的铁蹄、屠刀，同样会进行英勇的、不屈不挠的抗争。

在上述历史大背景、大环境之下，南京大屠杀还与悲壮的南京保卫战直接相连。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兵锋直指中国首都，从淞沪及杭嘉湖地区，一路杀到南京，必欲迫使中国在首都失陷的情况下“畏服”其武力。中国军队在唐生智将军的指挥下，在首都外围及复廓地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其行动可歌可泣，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中国守军在奉命撤退时，又未能有效地组织实施，致使近 10 万大军滞留江边或散居民间。这些便是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具体背景和环境。这一背景，直接影响到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与规模。

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内容当指屠杀。总的说来，这次大屠杀可分为集体屠杀与分散屠杀两类。集体屠杀，少至一二十人，多至数千、数万人，最多者一次达 5 万余人；分散屠杀，则有个别及三五人、七八人不等者。其残酷、暴虐的手段，可谓集古今中外虐杀之大成。在集体屠杀中，除刀刺、枪击外，尚有活焚、活埋与溺死者，甚至以汽油浇身后，再用枪击点火，使受伤者身披火

苗，翻滚狂跳，直至烧死。其分散、个别虐杀，则更包括刀劈、剖腹、活剐、锥戳、犬咬等，甚至以硝镪水浇身，遍体烧烂，折磨至死。两名日军少尉军官，还以杀人比赛取乐，初以杀满 100 人为限，以先杀满者为胜，后又改以杀满 150 人为限。其凶残卑劣，旷古罕见。除屠杀外，“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还包括了奸淫、放火与抢劫等各种暴行。攻入南京的日军，奸淫了成千上万的妇女，许多妇女被先奸后杀；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冲天，全城约1/3的建筑物化为灰烬，许多住宅、商店的财产被抢劫一空。针对日军对珍贵图书文物的野蛮抢劫，学术界还提出了“文化大屠杀”的问题，以唤起世人的注意。在这里，“南京大屠杀”一词，已超越了其狭义的屠杀内容，而是包含了日军犯下的所有暴行，成了一个广义的概念。

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一般说来，系指自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城陷之日起 6 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但是，这也只能是日军暴行最集中的时间，而非全部暴行发生的时间。严格说来，它的开始时间，比城陷之日要早。早在攻击南京的日军临近南京时，在其县郊即已大量发生屠杀等暴行。如栖霞山甘家巷农民李春香的父亲，便是在 12 月 10 日被日军无辜枪杀的①。骇人听闻的“杀人比赛”，系开始于 11 月下旬从无锡攻向常州的途中。它的下限，很难划出一个准确的日期。著名的《安全区档案》中所辑录的日军暴行共 444 件，其时间已展延至 2 月 7 日。市民彭问松在战后的一份陈述中，报告了日军于 1937 年 12 月至 1938 年 2 月间，在汤山屠杀韩德诚等 230 余人的事实②。当年在三汊河扬子面粉厂看大门的市民龚玉昆在一篇证言中，叙述了自己在 1938 年 3 月被日

①《李春香证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年出版第 450 页。

②彭向松陈述书，1946 年 5月 15 日，南京市档案馆藏。

军刀砍、放狗咬的悲惨遭遇①。家住江浦县石佛寺的青年农民周长荣，也是在 1938 年 3 月，被日军指为“中国兵”，进行毒打，用枪托捣断脊梁骨，留下了终身残疾②。德国驻南京外交官罗森于 1938 年 3 月 4 日致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称，2 月份与 3 月的最初几天，“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③。上述资料说明，到 1938 年二三月份，日军的屠杀与暴行都未停止。因此，将 1938 年二三月份也计入日军集中进行屠杀、施暴的时期，似较为妥当。

至于南京大屠杀的地域范围，一般说来，当以当时南京市政府所管辖的地区为限。南京沦陷前，市政府共管辖城内 7 区（含下关）及浦口、孝陵卫、燕子矶、上新河、陵园 5 个郊区，共 12 个区。发生在这 12 个区中的屠杀与暴行，当属南京大屠杀无疑。考虑到暴行时间相同、施暴部队相同、发生地点邻近等各方面的因素，位于南京周围的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六合等县，似也应计入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地域范围之中。事实上，国内外人士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中，早已包含了大量上述郊县的材料。如李克痕先生在《沦京五月记》中，提到了日军在江宁县六(陆)郎桥的暴行；崇善堂的埋尸统计表中，将从通济门外直至江宁县方山收埋的尸体，都统计在内；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收入了六合县与句容县的茅山、宝华山一带人民抗日斗争的内容；美国史密斯教授在名为《南京战祸写真》的调查报告中，即以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六合五县作为进行农村调查的主要对象。当然，南京大屠杀事件所包含的有代表性的、绝大部分的暴行内容，都

①《龚玉昆证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 432 页。
②《周长荣证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 429 页。
③《德国档案馆中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1 年第 2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发生在南京市所属的 12 个行政区范围以内。把几个邻近的郊县计入南京大屠杀的地域范围之中，只是为了更完整、更科学地考察和认识这一事件。

二

当今，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成了社会的“热点”问题。“热”从何来？除了亿万善良的人们，不能忘记 30 万南京同胞遇难的惨剧之外，还由于围绕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特别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妄图从根本上推翻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的定论以及当年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径。这种极少数人险恶的政治用心，同对于南京大屠杀问题学术上不同的见解，纠缠、交织在一起，这便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自 70 年代以来，日本史学界、学术界就南京大屠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

一是肯定派或称“屠杀派”的观点。这种观点，以日本史学界前辈洞富雄教授、著名史学家藤原彰和著名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为代表。他们采取尊重历史事实、揭露屠杀真相、维护中日友好的态度，肯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由于他们坚持侵华日军进行了南京大屠杀的观点，因此被争论对手称为“屠杀派”。原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洞富雄在 1973 年编撰出版的《日中战争史资料》中，将其第 8、第 9 两册定名为《南京事件》，公布了详尽而丰富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文、英文资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后来，他又在 1975 年和 1982 年根据多年来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成果，出版了专著《南京大屠杀》和《决定版南京大屠杀》。原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藤原彰，在 1985 年 4 月出版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记述了 1984 年底访问南京所获得的有关日军暴行资料，特别强

调，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是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严厉批判了那种不把这部分死难士兵列入被屠杀人数的做法。《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于 1983 年 11 月至 12 月，沿着当年日军进攻南京的路线，经杭州、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而至南京，调查侵华日军的暴行史实，对见证人和幸存者作了详尽和周密的采访，回国后写成 10 余万字的长篇报道《通向南京之路》，分 25 期连载于《朝日周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桥大学社会学部副教授吉田裕，于 1986 年 1 月出版了专著《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批判了日本文部省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错误立场。该学派在尊重历史事实、不回避历史责任的大前提下，对于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人数也有比较接近、但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他们对遇难人数的估算，大致在 20 万人、30 万人与三四十万人之间，与中国官方、学术界的说法大体接近。

二是否定派或称“虚构派”的观点。这一派以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作家铃木明和评论家阿罗健一等为代表。他们别有用心地推翻一切能够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把震惊世界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说成是“虚构”出来的，从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铃木明于 1972 年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等一系列文章；次年又将这些文章编撰成《“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以采访报道的形式，作出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结论。1975 年 11 月、12 月，山本七平将他在《诸君！》杂志上发表的长篇连载文章，辑成单行本《我方的日本军》上、下册，诬称“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1984 年 6 月，田中正明抛出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并公开声明“谨以此书奉献松井石根阁下在天之灵”，明目张胆地为南京大屠杀主犯招魂。1985 年 9 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中国南京建成以后，田中正明又在《正论》杂志发表

《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挑衅性文章,分别从当时的南京人口、外国人所作的调查、日本新闻记者的报道、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及崇善堂的埋尸数字等方面提出责难。另一位“虚构论”者阿罗健一于同年在《正论》杂志以“谜一般的‘崇善堂’及其实态”为题,竭力否认崇善堂的埋尸活动。田中正明等人系以卑劣的政治攻击来代替严肃的学术探讨。这一观点不断遭到日本国内外,尤其是中国大陆和港台等地各界人士的猛烈抨击,市场已经愈来愈小。

三是中间派或称‘过小评价’派的观点。该观点以秦郁彦、板仓由明等为代表。他们一方面认为进攻南京的日军确实屠杀过南京市民,不同于“虚构”派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又否认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只提出了一个相当小的遇难人数。日本有些学者认为“过小评价’观点,在实质上仍然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偕行》杂志于 1984 年至 1985 年间,连载亩本正已编的《证言所见之南京战史》,将南京遇难人数推定为 3000——6000 人。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板仓由明发表了《“南京大屠杀”数字的研究》连载文章,认为在日军攻陷南京后,南京城内及江宁县共死亡百姓 1.5 万人、士兵 3.2 万至 3.5 万人,合计约 5 万人;其中为日军非法杀害者,百姓为 5000 人,士兵为 8000 人,合计约 1.3 万人。接着,拓殖大学教授秦郁彦于 1986 年出版了专著《南京事件》。他在该书中声称,攻入南京的日军,共杀死百姓 2.3 万人、俘虏 3 万人;其中对老百姓的非法屠杀只应占其被害人数的 1/3 至 1/2,即 0.8 万至 1.2 万人。这样,日军屠杀的总数也只有 3.8 万至 4.2 万人。他认为:对“败残兵”、“投降兵”的杀害,是正常的战斗行为,不应算作非法屠杀;对老百姓中所谓‘便衣兵’的杀害,是对他们抵抗行动的‘处刑”,也不能算作非法屠杀。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指出,以秦郁彦、板仓由

明为代表的‘过小评价’论,是‘通过宣扬‘非大屠杀’,而使人们以为‘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是一种‘更巧妙的否定屠杀论’”。

与上述种种观点交织在一起,8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不断发生蓄意推翻历史结论、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事件。举其要者:一是1982年7月末,日本文部省强行修改高等学校教科书,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成‘进攻’或‘进出’,同时还极力缩小和淡化南京大屠杀暴行。二是1986年5月,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纂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把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描写成是日本被迫应战,有意掩饰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真相。三是1990年10月,日本众议员、前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在美国杂志《花花公子》上发表谈话,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四是1994年5月,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会见《每日新闻》报记者时,无视历史事实,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为了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政客们的叫嚣,早已越出学术讨论的范围,成了为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的严重政治事件。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的人数,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在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的年代里,中国的报刊、书籍中,确曾有过一些不尽相同的表述,少至10余万人,多至四五十万人。在战争状态下,以及尚未开展系统研究的时候,出现这种表述不尽相同的现象,不足为奇。但是,死难同胞的人数,受到各种档案资料记载,当时的环境条件,尤其是南京沦陷前夕人口数的制约,把它估计少了或者估计多了,都会出现逻辑上的混乱和矛盾。重要的问题在于尊重历史事实,即:一要尊重和承认侵华日军任意屠杀南京同胞的事实;二要尊重和承认侵华日军大规模地屠杀南京同胞的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具体的数字,是30万再多一些,

还是 30 万再少一些，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只要没有找到一份完整的屠杀“清单”，这个问题就会长期地讨论下去。

近年来，我国官方和学术界，已逐渐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的认识，统一在“30 万人以上”这一概念上。这个数字，最初出现在 1947 年 3 月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对这个数字的确认，反映了国共两党和台湾海峡两岸学者与人民的共识。同时，经过大陆学者对屠杀个案的逐一统计、掩埋尸体的研究、南京人口状况的分析等反复论证，认为这一估计和表述，是科学的、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对于前列极少数人别有用心的提问，我们相信，无需逐一回答，只要读完本书，便可一目了然。

三

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发生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事出皆有因，世上不存在没有原因的事件。

发生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可以从基因、主因、诱因这三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第一、基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性、疯狂性与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这是在中国的任何一块土地上发生大屠杀事件的先决条件。杀人者要有杀人的欲望与兽性，非此则不致发生大规模杀人的惨剧；被杀者要具备被杀的逻辑上的条件，如若他们个个跪地称臣、自愿作敌人的牛马奴隶，纵使敌人会兽性发作，杀人取乐，当亦不致有太大的规模。

日本自 19 世纪 60 年代明治维新起，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至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方被迫终止。日本军国主义以无休止地对外扩张为其特点，这一思想与政策，又同封建的、宗

教式的天皇崇拜制度与武士道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对军人的教育与要求，便是不择手段地忠于天皇、实践天皇的旨意。用军国主义思想培植、教育出来的军人，变得野蛮、残忍与疯狂。日本战犯山冈繁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及其所形成的可怕的精神状态：

>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正由于有这些思想，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①

一名参加攻击南京的第 10集团军士兵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使士兵变得粗暴、疯狂。他说："战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②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教授正确解释了日军士兵在战争中的复杂心态。他写道：

> 我认为，日本农民本来是善良和朴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在维新变革后，有一种封建的、恐怕带有残暴性的武士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作为"国民道德"强加在他们头上，而且还得到了神国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他们成了法西斯军队的凶猛的战士。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日本人强加于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过，是

① [日]山冈繁：《我的体验 控告侵略战争》，转引自洞富雄著《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65 页。

②《纳粹党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转引自洞富雄著《南京大屠杀》第 24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日本五十年来宣扬‘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①

侵华日军是一支军国主义的部队。他们的凶残、野蛮，构成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得以发生的最根本、最本质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没有杀人者举起屠刀，扣动扳机，就不可能有杀人的事实发生。

与此相联系，南京守军的英勇抵抗，使得这支军国主义的军队，决心用最凶残的办法来发泄他们的兽性。因此，这也是南京大屠杀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之一。

南京守军在日军已经进抵复廓阵地的情况下，毅然拒绝松井石根的劝降传单，用顽强的抵抗作出了回答。这使日本侵略军希望迅速解决南京战斗的意图，受到了顿挫。后来在夺取城垣的惨烈战斗中，日军把当时战斗的景象描绘为一幅‘地狱图’。日本军队在淳化镇、紫金山、雨花台、光华门、中华门、杨坊山等阵地的战斗中，都发生了重大的伤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方对攻击光华门的战斗记称：‘在血战三日的猛攻中，部下死伤颇多，疲劳困苦已至极点。’②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为南京大屠杀事件接受审判时说：‘自登陆上海以来，因苦战恶斗，付出巨大牺牲，激起我官兵强烈之敌忾心。’③ 1938 年初担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的天谷少将，则认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④。日本航空兵中士井手纯二曾目睹一名‘40 岁上下长胡子的应征兵’，一边

① [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第 269 页。

②南京日本商工会议编《南京攻略史》，昭和 16年8 月发行。

③「日]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80 页。

④ [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第 238 页。

吼叫着“为××战友报仇！尝尝我的厉害！”一边挥动大刀砍杀中国俘虏。[①] 一位留在南京的外籍教授报告说:日本侵略军“早把国际公法搁到脑后，他们公开承认是为了复仇，是为了要给现在占领南京的军队中已告阵亡的同伴们复仇”。[②] 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松井、天谷之流为屠杀暴行所作的辩解，但是上述战争场景和士兵的心态，也确可作为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发生原因的参考。

翻开中外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一个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规律:有侵略、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反抗就有报复,报复是侵略、压迫的继续。古代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及起义失败后奴隶俘虏的被残酷处死，中国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最好的例证。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也加剧了日本侵略军的报复心理，使他们在后来的暴行中表现得更加残忍、疯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京保卫战的进行，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成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基本原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原因”,决不等于“理由”:“原因”只是事发之因,并不影响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理由”则包含了对于发生事件的理性上的肯定。如果把原因说成理由，那就成了强盗的逻辑。

第二，直接原因是南京这个城市的特殊重要性。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军企图通过对首都人民的大规模屠杀，迫使中国人民停止抵抗。

前面所说的“基本原因”,只是在中日战争以至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发生暴行的一个带普遍性、根本性的原因。没有敌人的残暴与被侵略者的反抗，大规模暴行的发生，便失去了起码的条件;

①李秀石编译《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争论》,《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

②《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193页。

不管某一地区或城市，有如何特殊的重要性，在它那里是否发生暴行，都要受到前述“基本原因”的制约。但是，基本原因毕竟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条件，如果不去解剖矛盾的特殊性，则无法回答，同样是对凶残的日军进行激烈抵抗的北平、天津、太原，尤其是奋战了 3 个月之久、给敌人以重创的上海，何以竟没有发生如南京规模之暴行？这说明，南京一定有不同于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之处。

对于南京的重要地位，以及松井石根之流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有一段绝好的叙述：

> 当松井被任命为上海军司令官离东京赴战地时，他已经想好了在预定的占领上海后就进兵南京。他在离东京前，要求给上海派遣军五个师团(按即师)。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所以他对进攻南京作了实际的准备。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松井发表声明说："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因为预计要扩大上海周围的战区，于是任命松井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
> 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任命武藤章为松井的副参谋长。在占领上海的一月以后，日军到达了南京郊外。松井发出一个命令，大意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招降置之不理，于是开始了轰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终于失陷了。进入南京的日军虽然是新编的部队，但它是由有经验的部队组成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松井得意扬扬地进了城。自十二月十三日起发生了人所共知的“南京大屠杀事件”……①

①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 1953 年中文版。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华中方面军，早在活动于苏州、嘉兴一线时，便于 11 月 22 日向参谋本部电呈：“为了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他们表示,将“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来达到这一目的。

尽管在古往今来的战争中，一国首都的失陷，对于战争的胜负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首都的存亡，毕竟在心理上、精神上与实际指挥上，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因首都失而国亡者亦不乏其例。尤其是占领者一方，一般都对占领对方之首都抱有超常的企图和欲望。因而，为了进一步发扬日本侵略军的“武威”，使中国军民‘畏服”,使对南京的占领具有更大的‘价值”,作为侵略战争的延伸，以种种凶残、野蛮的暴行，来达到既定的目标，便不难理解了。

在这里，作为首都的南京，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构成了这场大屠杀发生在南京，而不是发生在同样进行了英勇抵抗的其他城市的主要原因。

第三，间接原因是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使将近 10 万大军滞留城内，一部分潜入民间。

在论述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基本原因与主要原因之后，对于原因的探讨并未完结。因为‘基本原因”,只是带有普遍性、根本性的原因,它适用于在中国及世界任何一个相关的地区或城市。直接原因,只是强调了南京城在某一方面特别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但是，其他对凶残侵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的城市，却可以在另一个方面，具有超过南京的特别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例如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金融集散地与经济中心，侵华日军未尝不想通过对上海军民施以凶残的暴行，来消磨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因此，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之所以发生在南京，除了南京是中国的首都这一特殊条件外，必定还具有区别于别的城市的其他原因。这就是

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12 月 12 日,唐生智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组织全军撤退。但是他撤退无方，组织紊乱，却是一大失误。在组织退却之初，唐生智考虑到时间紧迫、人多船少的客观情况，确定了“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原则，规定只有卫戍司令部各级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第 36 师由下关码头渡江,其余部队均由正面突围。这一原则，本来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就当时敌我军力的对比，以及敌军仓促奔袭的实际情况，日军一时还不可能严密封锁到使中国军队无法突围的地步。但是到唐生智正式宣布撤退令时，却又临时规定，第 87 师、88 师、74 军、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一下子将输送过江的部队数量陡增了 5 个师以上,形成‘大部渡江,一部突围’的局面。这是当时运输力量根本无法承受的。此口一开，许多原定突围的部队，均蜂拥至江边，其数量近 9 个师，江边人多船少，秩序极为混乱，以致大批无组织的部队滞留江边与城内，一部成为日军俘虏，一部潜入民间。

据统计,南京守军共为 13 个师又 15 个团,计 15 万人。其中，战斗伤亡约 1 万人；安全撤离南京者约 5 万人；滞留在南京的官兵达 9 万人之多。[①]这 9 万名滞留南京的军人，除极少数人侥幸逃离，或免于一死外，其绝大多数都为日军或作俘虏，或作“便衣兵”而加以屠杀。这一数字，差不多占了 30 万遇难同胞总数的 30％，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与数量，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还没有第二个城市，在失陷之后，有 9 万名军人继续留在城市里，既无法撤出，又不能组织成可以战斗的武装集团。

滞留在南京城的军人，群龙无首，一盘散沙，被俘者数以万

①孙宅巍:《南京大屠杀与南京人口》,《南京社会科学》 1990 年第 3 期。

计。而日本侵略者的既定方针，就是要采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国屈服。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当年 9 月叫嚣，“日本帝国所能采取的唯一道路，就是使中国军队完全丧失战斗意志”；松井石根曾亲口命令，对战俘“纪律肃正”，即予以屠杀；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也曾亲署命令“杀掉全部俘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指出：“好些中国兵在城外放下武器投降了。在他们投降后 72 小时内，在长江江岸被机关枪扫射而集体的被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达 3 万人以上。”① 南京城内外大量俘虏的出现，使日军屠杀俘虏的罪恶预谋，得以一再实现。

大批放下武器的军人潜入民间，为日军搜捕、屠杀提供了借口。日本侵略军进入南京城后，正是打着搜寻“中国军人”的旗号，大肆捕捉无辜市民，恣意杀害。在许多场合，日军不分青红皂白，不论男女老幼，一概加以残暴的屠杀。但是，也有一些场合，日军确是按照一个军人可能具备的特征，如额头上是否有帽痕，手心、肩头是否有老茧等，来决定是否捕捉一名男性青壮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写道：“任何人的手上只要发现硬茧，就可以指为当兵的证据，必死无疑。”② 见证人张道富在证言中说：“日本兵到难民区来抓人，一看见男人，就检查头上有没有帽沿印、手上有没有老茧，如果有就认为是当兵的，抓去杀掉。”③ 因此，可以说，大量中国官兵潜藏到民间，部分地为日军加害中国平民百姓与扩大暴行的规模提供了借口，诱发或促发了一部分本可避免的屠杀事件的发生。当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军人与百姓的区别，本身并不科学，或者说，本身就是侵略者施暴的一种借口；而任意将被指认为“军

①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②《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1 页。
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 46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